

《北去来辞》出版近六个月了，我正在渐渐把它忘掉，在完全忘掉之前，我还要说点什么呢？我并不喜欢对作品进行自我阐释，关于作品的初衷、主题、思想之类，我觉得这种自己的阐述会限制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创作谈是我感到为难的一类文章。只有在很少的时候，我觉得似乎要说出那么几句——关于时代、历史、世界、自我、人性、欲望、城市和乡村……但忽然又感到，那要说的一切已经被我切碎之后摺在书里了，这样一想，不如就算了吧。

希望我的书和读者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所谓“诗性”，我认为绝不是“诗情画意”之类，而是，在感知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充满歧义的可能。

那就谈谈写作的过程吧。2007年写完《致一九七五》之后，我觉得自己或许从此就不再写长篇小说了。我出门旅行，陪女儿高考。不料过了两年之后又写了起来，初稿有十六万字，我称之为《银禾简史》。这时候正好有一个机会到埃及去，在旅途中思维特别活跃，我想到要给这个长篇加进一些重要的东西。那天正

好是住在红海，于是我就把新加的人物叫做“海红”。

之后我从北京到武汉再到广西北流，随身的包里一直放着我的纸质笔记本和笔，以便把纷沓而至的念头记在纸上。就这样，这

写出我在这个时代的百感交集

林白

部长篇把我越来越紧地箍在了它身上。我沉浸其中，对海红这个后加人物的兴趣渐渐超过了银禾，她的失眠、漂浮、纠结、迷乱，她的神经质和自我审视，她的日渐凋谢以及自我更新的企愿……这一切，是那样地一次次逼近我。我不停地倒腾她的前世今生，以至于一再延宕。

每改一稿就加进不少内容。沿着海红的足迹，我看到这部长篇达到了现在的体量，这是我动笔之初未曾想到的。而海红也最终成为这部近四十万字长篇的第一女主人公。我看着她，仿佛看到了自己。

个人经验是这部书中至为重要的内容，这意味着，除了我自己的个人经验给予书中的人物，

同时也必须为书中的人物找到属于他们的个人经验。

个人经验是一种实感经验。“实感经验”这个词来自复旦大学张新颖和刘志荣的一本书，我一下十分喜欢，实感——具体、鲜

活、生动、丰富，不可以被理论、观念所充分涵纳，在虚构性和创造性作品中，它给作品带来不可化约的品质，从而使我们不至于沦为观念的传声筒。充沛的感性体验（而不是某种“高于生活”的理论）是我多年来不竭的源泉，在《北去来辞》写作的漫漫长途，我再一次凭借着它，前所未有地，写出了自己在这个时代的百感交集。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难度的写作，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物，如此深长的时间来到我的笔下，我也从来没有如此地感到自身和人物局限。我的笔记本写满了六个，还不包括只写了半本的那另外两个。我不断地增添内容，同时谨慎地删去一些篇章。我还神

经质地一再给这部长篇以新的命名，但每次命名又都觉得不甚满意。定稿最终删掉了许多——有十几万字被废弃了；书名也从在《十月》发表时的《北往》变成了《北去来辞》。虽然有的朋友不喜欢现在这个题目，但我一意孤行。三年来我有时坚定，有时犹疑、徘徊，但始终感到内心还是满溢的。

我竭尽所能，要让海红突破她与现实的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找到与世界的真切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够真确？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才能共存。真希望一直走在一条辽远的漫漫长途上，做一个与天地万物风雨同行的人。

世界到底广阔，除了人类社会，还有大自然，以及深远处的宇宙。对于人类面临的种种困境，我常常心怀忧虑。不过，一个九零后的女孩对我说：如果人类被自己折腾灭绝了，那说明这个文明已经腐朽，就让它灭绝好了，肯定会有新的文明诞生。

写完《北去来辞》，感到自己身上出现了一个更有热情的写作者，感到有一处源泉正在被自己撬开。

说起赛珍珠

——夜读抄

邵燕祥

胡平关于台湾现代史上《坚贞者，变节者，自首者》一文（《随笔》今年第二期），写到台湾本土人、中共地下党烈士郭琇琮，有一个细节：

“光明报”一案发生后，一天入睡前，郭琇琮忽然对妻子说：“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将来可能要牺牲的！”怀抱初生婴儿的妻子，纤手撩动着孩子红扑扑的脸庞上那一片细细的茸毛，对生命之春的美好无限憧憬，却对一个总是将历史的胎动死死压于腹中的政治的残酷浑然无知。郭琇琮去书房拿了一本书来，是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的第一本小说《爱国者》，小说时代背景从1926年直至1938年的中国大陆军阀混战时期以及其后的抗日战争。他翻出一页给妻子看，这是描写一百多位爱国青年在长江畔被枪决的文字……

赛珍珠的这本小说我没读过，不知大陆有没有译本。我以为仅凭这里引用的，她在那个中国人蒙受着巨大苦难的年代，秉笔直书中国爱国青年惨遭屠戮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她的人道情怀，她对第二故乡的中国人民的热烈的同情。

在这之前，她在小说《大地》中对中国农民表露的友好感情，也是实在的。

于作品之外，像赛珍珠对林语堂介绍中国文化著作的推荐，也都与她对中国文化的关切分不开。

想一想，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在中国，有几部凝聚大心力写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长篇小说如赛珍珠的吗？有多少作家作品涉及中国青年一代为国牺牲的壮举？在白色恐怖的文网之下，文人作家被围追堵截，不得发声，有赛珍珠这样对华友好的作家，努力写作中国题材，难道我们不应心怀感激么？

但在《大地》1938年获得诺奖的前前后后，我们这里颇多挑剔之声，更不用说在后来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对这位友好的美国人视若无睹，以至恶语相加。

我不知道赛珍珠在她的晚年，对中国和中国人是怎样看的，她是否仍然相信早年她对自己曾亲近过的中国普通人的判断？她是否还保持着对中国人的好感？抑或她伤心地质疑：为什么中国人会变得如此的苛薄寡恩，仅仅是感于一时的偏见，还是杂有根深蒂固的国民性传承的弱点？



端午诗三首

一逢端午一追思，角黍堆盘酒满卮。树惹滋兰千载后，今朝清气入谁诗？

杨逸明

佳节何人解溯源，能娱口腹自千年。离骚今日谁知诵，重五犹凭角黍传！

刘永翔

汨罗江上说同源，榴火三千五百年。叶叶心心舒又卷，是蒲风把国风传（和永翔兄）

汪凤岭

低调的金牌编剧

俞亮鑫

们，并郑重地为大家题写寄语，似乎冥冥之中在向大家告别。杨总告诉我，重拍《围城》一直是他近年来的最大心愿，可惜，如今他突然辞世，能够充分理解和重新演绎国学大师钱锺书先生这部经典名作的编剧却很难找了。这真是一书分发给办公室的同事

英雄泪满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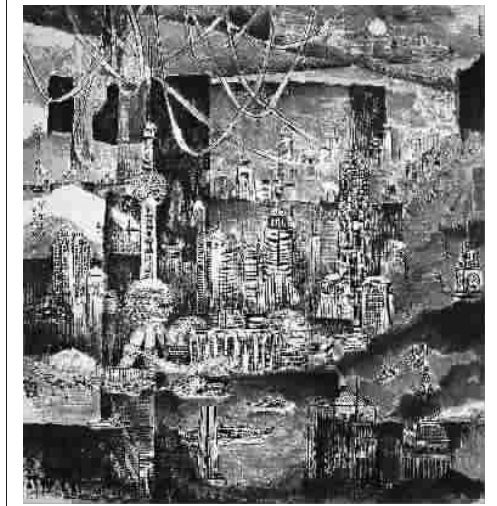
我认识孙雄飞是在1988年秋。他陪同我前去采访刚刚由于主演了电视剧《末代皇帝》而走红的陈道明和导演黄蜀芹，并一路上给我介绍自己是如何去北京与治学严谨的钱锺书、杨绛夫妇见面，最后在他们认可了经过反复修改的剧本之后，才最终同意把《围城》搬上荧屏，言语之间，充满了成就感。他对钱、杨两位先生充满敬意，称他们尽管是文化大家，在生活中却是何等谦虚、何等低调、何等简朴。

实际上，孙雄飞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淡泊名利，行事低调，尽管他创作颇丰，既有电影剧本《小字辈》《大小伙子》等，又有《围城》《蛙女》《称心如意》《洋行里的中国小姐》等。他更为《情深雨蒙蒙》《粉红女郎》等60多部电视剧担任责编和策划，其中《颠倒主仆》荣膺法国巴黎华语电视剧雄狮奖；《十八岁男子汉》获上海电视

此名？”“因为它是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高粱五种粮食之精华酿造而成。”杨惠泉胸有成竹地说：“如此佳酿，起名不可随意。此酒既然集五粮之精华而成玉液，何不更名为五粮液？”

通过这两例，大家明白了书面语言是由口头语言加工而来，而又更为简练、富有美感。接着，有同学说，故乡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也很有名，但名字不雅，让人难明其意。有次到了劝业场，看了店堂说明，我才弄清其意。还有个同学说，有位外国诗人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在清香的碧螺春茶汤里，我看到了江南明媚的春光。”如果说成“在清香的吓煞人香茶汤里，我看到了江南明媚的春光。”将是何等的别扭！

作家秦牧曾说：“一例胜千言。”精当生动的例子，不仅能说明观点，更能激起人们思考的兴趣和丰富的联想。



如日之升 (国画)

沈舜安

讲到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时，我举了两例：

——碧螺春茶原是一种野茶，生长于太湖东山的碧螺峰石壁。有一年，野茶长得特别茂盛，采下的茶叶竹篓里装不下，采茶人就把多余的茶叶放入怀里。谁知茶叶沾着热气，透出阵阵异香。“这茶叶的香味吓煞人！”人们嚷了起来。从此，这种野茶就被叫做“吓煞人香”。明代宰相王鏊，本就是太湖东山人，觉得此名不雅，便根据它原产于碧螺峰，以及古代常用“春”字来代称茶的习惯，将其改名为“碧螺春”。

——名酒五粮液之名也是由清末四川文人杨惠泉所起。饱读诗书的他，面对科举考试的废除，甚是抑郁，整日饮酒做诗。在一次宴会上，一酿酒老板带来一罐倾注他十多年心血的“杂粮酒”。酒一打开，满屋喷香，令人陶醉，独杨惠泉不语，他边品酒，边暗自思忖：“忽然间抬头问酒的主人：‘此酒何名？’”“老百姓称之为‘杂粮酒’。”“为何取

一例胜千言

毛荣富

与馆员们的待遇相同。由此可见，文史馆对于馆员的关怀照顾乃是一视同仁，并无二致。

尽管市网第二商业局在1960年12月召开的各区商业局长联席会议上就把向文史馆馆员增量供应豆腐的工作

布置了下去，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少许麻烦。比如，有的馆员1月份买到了特供的豆腐，但到2月份却被菜场告知因未继续接到上级通知而暂停供应；同住泰安路120弄的馆员张佩芳和徐善祥，前者每月都顺利购得当地菜场送来的豆腐，而后者从1961年1月开始就未见菜场工作人员上门服务。询问菜场管理人员之后，得到的答复同样也是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更有甚者，住在淮海中路周边区域的29位馆员一直未享受过这一特殊照顾。有鉴于此，市文史馆多次与市第二商业局业务二处联系，并提出发放临时购买证或在馆员的副食品供应卡上加盖“每旬加购豆制品一角”字样等建议。商业二局方面对此亦高度重视，于1961年4月17日发出《关于对文史馆馆员照顾供应豆腐的通知》，进一步重申了对市文史馆馆员每人每月照顾供应豆腐的政策。各区副食品公司随即着手对辖区内的相关菜场进行排摸核实。那些过去对照顾政策敷衍了事的菜场也纷纷派人主动登门，与馆员取得联系。自那以后，馆员们都按时足量地购得至特供的豆腐。每当增聘新馆员后，文史馆还会将其姓名与住址及时抄送商业二局，一并加入专供系统。

这则有关豆腐的典故，细细品来，令人回味无穷。小小豆腐，传递的却是党和政府敬老崇文、尊贤尚德的一番浓情厚意。

捐献给国家，是《百桃图》的最好归宿，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文史馆春秋

小小豆腐，情深意浓

张姚俊

文史馆的设置体现了中华民族敬老崇文的优良传统。在早期文史馆的诸多职责中，照顾馆员生活，使馆员老有所养无疑是其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档案显示，在历史困难时期，文史馆千方百计地将“敬老”的宗旨落到实处。

1959年后，由于农副业生产受灾减产等诸多因素，上海的副食品货源日趋紧张，多种主要副食品相继纳入凭票凭证供应的范围，甚至还出现连续数月停供猪肉的情况，就连平日里最不起眼的豆制品也成了“紧俏商品”。副食品供应的短缺也影响到了文史馆馆员们的日常生活。至1960年末，文史馆共有馆员324人，其中居住在市区内的为314人，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了73岁。馆员中除去93人可按月领取到由市人委发放蛋、肉营养券外，大部分馆员只有计划供应的那点副食品。这一切让平海澜等文史馆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要向每位馆员供给肉蛋，恐非文史馆力所能及。此时，平海澜馆长他们突然想到了豆腐。豆腐是中国传统美食，营养丰富，软滑爽口，最适宜老者食用；且较之肉蛋，解决馆员的豆腐供应问题，难度亦少却许多。

于是，经与市第二商业局商洽后，文史馆决定自1961年1月起，向家住市区的馆员每人每月照顾供应3斤豆腐。考虑到不少馆员行动不便及存放的不便，这些豆腐可由馆员或其家属前往居住地所在的菜场每月分三次购买，也可委托菜场送货上门。

为了周全起见，文史馆专门编印了一份豆腐供应名单。翻开这份印制于1960年12月31日的名单，袁希洛、钱化佛、王个簃、丁悚、朱屺瞻等耆年硕学之士均名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李青崖、陶菊隐虽身居副馆长，却也